

唯物史观视域下人工智能与意识问题研究

符越, 韦小婉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辽宁 沈阳 110136

DOI: 10.61369/ETR.2026230029

摘 要 : 随着通用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 人们对于人工智能能否具备或超越人类意识的探讨愈发热烈。当下, 无论是神经科学的“还原论”路径, 还是心灵哲学的分析方法, 都没有真正触及意识的实质。本文站在辩证唯物主义视域下, 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对意识与人工智能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意识镶嵌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之中, 以此作为理解意识本质的基石, 它不仅为我们理解意识问题提供了一个全面视角, 还有助于我们解开人类意识的谜团, 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指明前行方向。

关 键 词 : 意识; 人工智能; 马克思主义理论

A Study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nscious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erialist Historicism

Fu Yue, Wei Xiaowan

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136

Abstract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r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scussions about whether AI can possess or surpass human consciousnes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nse. Currently, neither the 'reductionist' approach in neuroscience nor the analytical methods in philosophy of mind have truly touched the essence of consciousness. This paper adopts a perspective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uses a method that unifies history and logic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d comprehensive study on issues related to consciousnes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rx and Engels embedded consciousness within human material productive practice, using this as the cornerstone for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of consciousness. This not only provides us with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consciousness but also helps us unravel the mystery of human consciousness and guid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words : consciousnes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rxist theory

马克思主义理论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以来, 经历了180多年的发展, 特别是在百年“中国化”的实践中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 发展至今, 其最为宝贵的品格就是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当下,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在飞速发展的同时, 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挑战。例如, 强人工智能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吗? 如何理解当下最火的类脑计算系统? 这是否意味着人工智能未来能够产生自我意识和理解能力? 这些热门话题成了当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急需回应的时代问题。习近平在向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致贺信中强调: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 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 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1] 因此, 我们当前的研究要及时跟上人工智能发展的步伐,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层面回应与人工智能的相关问题势在必行。

一、意识的终极之迷

1974年, 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 (Thomas Nagel) 发表了一篇名为《成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样的体验?》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 内格尔提出“意识是身心问题真正难以解决的原因。”^[2] 内格尔认为, 感觉或者体验是纯主观的, 既无法描述也不可观察, 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回声定位在蝙蝠心中是什么样的感觉。夏日炎炎的午后, 一杯冰镇汽水给我的精神体验只有我自己能够理解。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 意识与神秘主义都画上等号。很多人无法真正把握辩证唯物主义意识观的实质, 其原因在于, 意识观是一个非常复杂且极度难度的研究课题。马克思主义认为, 实践活动不但形成了社会存在, 而且还创造了人类意识。从意识的起源来看, 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意识不是从来就有, 意识的产生经历了漫长过程。我们不妨把时间的指针往前拨动, 看看意识进化的历史。沧海桑田, 地球大约年龄在46亿年左右,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地球上只存在无生命的物质, 而宇宙万物在相互作用中

项目信息: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人工智能前沿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L22CZX003)。

作者简介:

符越 (1988—), 女, 辽宁盘锦人,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

韦小婉 (2001—), 女, 湖北武汉人,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

双方都会留下“痕迹”，如滴水穿石、岩石风化，这就是一切物质所具有的反应特性。而大约在30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生命，物质的反应特性发生了质的飞跃，出现了低等生物的刺激感应性，即生物对外界环境的应答能力，如一碰就会缩起叶子的含羞草、不停追逐着太阳的葵花。大约在6亿年前，地球海底上出现了一群既没有眼睛也没有嘴巴的奇怪生物，这就是被后世命名的迪卡拉生物群（Ediacaran biota）。科学家经研究发现，埃迪卡拉生物群主要靠几十亿年来细菌在海底的不断繁衍产生的丰腴菌苔来生存。但是，这样“躺平”的生活终究会落下帷幕。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有些生物为了生存进化出调控运动的神经系统，而神经系统的出现让意识产生成为了可能。

应该如何理解神经系统？它就好比两军交战中负责作战指挥的指挥官。在战场上，如果没有指挥官很容易出现各自为战、乱作一团的情形。这个时候，指挥战士协同行动的角色就显得极其重要。与之相似，能够协调全身细胞在电信号作用下统一运动的角色就是神经元。“草履虫，也能产生并使用这种讯号来支配它们的行为。但是神经元运用它们的讯号来影响其他细胞，也就是其他的神经元、内分泌细胞（它们会分泌出化学分子）。”^[6]神经系统的出现让生物的进化开上了加速器，很快，能够捕捉外部世界经验模型的眼睛、耳朵等感觉器官就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是，单独的感觉系统自身无法捕捉感觉和经验。视觉皮层、视网膜、视觉通路和视觉系统为我们描绘了外部世界的地图，但是，只有这三种处理方式的协调运作，才能使图像与我们的有机体联系起来，真正地感受它。只有这样，经验才能出现。由此可知，仅仅具备感觉器官还不足以产生经验意识，我们需要一个处理器来处理感觉系统所提供的大量信息，这个处理器就是大脑。有了大脑，高等动物就具备了一个初级的感觉意识（感觉和心理）。感觉意识是高等动物捕捉周遭世界所能得到的外部信息，它更多的是一种知觉能力，而这种能力让高等动物“通人性”成为可能，动物学家会非常直白地告诉你，所谓的聪明动物都是人类长期训练的结果。高等动物有意识吗？这个很多人都为之困惑的问题我们必须明确回答，有，高等动物具备意识的初级阶段也就是感觉意识，但是它远没有达到人类意识的层级。从感觉意识到自我意识，心理学家曾经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意识进行层级划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提及的意识特指人类意识，我们必须注意精准使用意识的概念。人类意识包含情感意识、审美意识、自我意识和智能意识等等，它包含非常复杂的具体内容。不能用情感意识代替人类意识，学界对于动物是否具有情感意识存在着争议。大约在300万年前诞生了人，有了人才有了人类意识。人的意识活动是一种自觉主动的活动，能够认识事物的现象和本质。

那么，到底是什么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给出了最为精准的定义：“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如果说内格尔是用“成为一个X是什么感觉”来对意识进行测试的话，马克思恩格斯则通过意识的构成内容——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社会实践过程来强调意识的独一无二性。这凸显了意识的社会属性，“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

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6]。只有当社会生产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意识才能摆脱现实世界的桎梏去构造那些“‘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从马克思主义意识观的角度去理解宗教不难发现，所谓的“神祇”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看到它们的人物形象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找到相应的原型。例如，上帝是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形象，玉皇大帝则以一个中国人的形象示人。马克思指出，宗教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虚幻的反映。离开了客观存在，意识就会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如今，宗教在世俗化的过程中更加与时俱进，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白种人形象，著名的科幻小说《美国众神》里刻画出不同人种的上帝形象。毫无疑问，意识的发展受到物质生产活动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诠释清楚“物质决定意识”的理论内涵。由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不同于以往哲学家，他们是“从意识深度‘镶嵌’于其中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去把握一定历史条件下意识之存在方式”^[6]。

另外，意识对物质的反映并非被动的“镜像式”复刻，而是在实践活动下的主动建构过程。这种建构性体现在意识能够对感性认识进行加工改造抽象出理性认识。比如中国古代长久以来的农耕文明凝结着先人的长期实践智慧，农民在农业生产实践中，不仅能通过感官感知到土壤湿度、作物长势等外在现象，更能借助长期积累的生产经验与农业知识，从这些现象中提炼出作物生长的规律。以此划分年份为24节气，并据此调整耕作行为。这种从现象到规律的跃升，正是意识能动性的核心体现，而这一过程始终依赖于具体的物质生产实践。若脱离实践，意识便失去了加工改造的对象与动力，无法形成真正的人类意识。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还包含另一个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建筑师和最灵巧蜜蜂的对比来说明意识的“先在性”，显示出意识对于物质生产活动产生的巨大作用。同时，意识的“主体选择性”表明整个物质生产都是围绕着意识活动所构建的目标和蓝图来进行的。物质和意识之间的“交互性”用马克思最经典的一句文本可以表述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7]。意识的“先在性”与“交互性”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原始社会，人类意识的“先在性”体现为对简单工具如石器的粗糙构想，目标是满足基本生存需求；随着社会分工细化与生产力发展，人们对于先有的劳动工具不再满足——从青铜器时代对冶炼工艺的设计，到工业革命时期对蒸汽机原理的构想，再到当代对人工智能算法的研发，意识所构建的目标和蓝图愈发集中也愈发精密，对于物质生产的反作用也愈发显著。而意识与环境的“交互性”则表现为：每一次意识对物质生产的推动，都会重塑人类的生存环境；新的环境又会催生新的意识需求，进而推动意识进一步发展。这也再次证实马克思唯物史观对意识问题解读的深刻性，意识的发展并非抽象的逻辑推演，而是与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紧密绑定的现实过程。不难发现，在探析意识经验难题的道路上，马克思恩格斯不同于其他人的思维方式，他们运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论原则打破了意识迷思的第三堵墙。

二、关于人工智能意识问题的争论

近些年，很多专家发表了自己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前景的看法。众所周知，约翰·赛尔把人工智能划分为强人工智能（Strong AI）和弱人工智能（Weak AI）两种类型。构建出具有人类的思维模式（像人类一样学习、推理和思考）的目标程序，被称为强人工智能，而不具备人类的理解能力，只能执行特定功能（如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的程序，被称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两者最大的意见分歧就是人工智能能否具备和人类一样思考、学习和反思的能力。萨塞克斯大学的玛格丽特·博登教授否定了强人工智能（Strong AI）的发展模式，大陆哲学学派的德雷福斯教授甚至把人工智能和中世纪臭名昭著的炼金术相提并论。与之相对，奇点大学创始人兼校长雷·库兹韦尔对强人工智能的发展持乐观的态度，表示在2045年人工智能或将超越人类智能。斯蒂芬·霍金教授提出的“人工智能威胁论”影响最为深远，一时之间，“人工智能将形成自己意志”的观点甚嚣尘上，这也使人工智能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两派的意见分歧最终可以归于“人工智能能否达到或超越人的意识”这个问题。对强人工智能发展持积极态度的专家深受英美的心灵哲学的影响，他们从心灵哲学二元论的角度来理解人工智能，将其定义为机器身体和机器心灵的融合。对于这一问题，最早可以追溯至近代哲学奠基人笛卡尔身上。笛卡尔认为，要思考和感觉就必须有意识，有意识就必须有心灵，心灵是人所独有的。笛卡尔试图找到在大脑中心的松果腺（Pineal Gland），在他看来，松果腺是人类心灵的位置所在。当然，这个松果腺是找不到的，但是，身心关系成了哲学史上最为经典的研究课题之一。如今，在心灵哲学家看来，心灵之于大脑正如计算机的软件之于硬件。“硬件设施”不重要，因为它只不过给心灵提供了一个“容器”。这个“容器”可以是人的身体，也可以是无机的机器。美国哲学家普特南就构造了一个大脑和身体相分离、“心灵”移植到“缸中”的思想实验，这就是著名的“缸中之脑”。

实际上，“缸中之脑”根本经不起科学的验证和逻辑的推敲。现代脑科学研究表明，人脑意识的产生不仅依赖大脑皮层的机能分区，更依赖神经元之间复杂的“突触连接”与“神经递质传递”。“缸中之脑”假设仅将大脑视为“信息接收终端”，忽视了意识产生所需的“动态生理过程”：大脑需要持续从身体获取血液、氧气及营养物质，维持神经元的活性；需要通过身体的感官获取外部世界的“多模态信息”如视觉、听觉、触觉等，这若将大脑置于“缸中”，仅通过电极输入模拟信号，无法模拟身体对大脑的生理支持，也无法模拟多模态信息的“真实交互性”，更无法模拟信息与大脑生理状态的动态关联。正因为这些类似碰到热水会同时感到“烫”和“痛”的真实体验，以及人在饥饿时不断向大脑发出信号去吃饭，才能使人更真实的感受世界物质的真实性和感受自身人体的奥秘。这些信息通过神经通路传入大脑，与大脑内部的记忆、经验相互作用，才能形成完整的意识。另外，印度狼孩的故事告诉世人，如果脱离了人类的生活环境，不会产生与语言相联系的抽象思维和人的意识。所以说，人类的直

立行走和语言并非天生本能，这些都离不开社会实践和劳动，社会劳动在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劳动为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需要和可能。劳动不仅要求人们认识事物的现象，而且要求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有抽象思维能力，必须具有不同于动物感觉和心理的特殊的反映形式，即人的意识。第二，在人们的劳动和交往中形成的语言促进了意识的发展。在劳动过程中，协同行动的需要导致了语言的产生。恩格斯指出，“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增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8]语言使人脑能够用词来概括各种感觉材料，进行抽象思维活动，使人类获得了交流思想的工具，从而推动了人类意识的产生。因此，“缸中之脑”不仅违背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在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也与神经科学揭示的“意识物质基础”相悖，本质上是一种脱离现实的逻辑虚构。

如果说心灵哲学家的最终命题是研究清楚心灵活动的运行原理的话，神经哲学家则以神经科学来捍卫物理主义的荣耀。神经科学证明，人的意识活动实际上是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和脑区域的协同工作，其运行机制是大脑在接受由人的感受器官提供的各种信息后，再对信息内容进一步整合分析并传出的过程。这种特定“输入（input）+输出（output）”的模式似乎一下子让“AI”专家找到了未来发展的方向，那就是模仿人的意识活动原理打造AI的运行程序。实际上，当下以类脑计算芯片为核心的各种类脑计算系统就模拟了生物脑结构的活动原理。在神经哲学的代表人物丘奇兰德夫妇看来，神经科学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早晚有一天我们能够揭开大脑神经系统的神秘面纱。在他们看来，未来的社会不再需要语言沟通，人们可以通过大脑中的电子转换器传递神经元信号完成意识的交流。前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马文·闵斯基甚至乐观地表示，百年后人类可上传人格至机械载体，死亡将不复存在。我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仿造人的意识活动，把意识上传云端、打造数字生命。这一目标的实现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关于人的意识的一切都可以用物理科学的还原主义来解释，这一前提能够成立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能仅凭科学的“还原论”来把握意识的全部内容。当下，我们对于人类大脑的研究还没有完全揭示其自身的奥秘。人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大脑中“你”（心灵）的那一部分到底在哪里，我们知道楔前叶皮层这样的区域对心智产生着最关键的影响，但光靠它自己无法产生意识。大脑的组织结构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神经元调整和处理信息的方式非常复杂，人脑的神经网络功能独一无二、无可比拟。

从形而上学的发展历程上看，意识问题的探讨始终围绕“意识与存在”的关系展开，不同哲学流派的分歧本质上是对“存在”的理解差异。洛克将“存在”等同于“感官经验”，因此把意识视为“经验知觉的集合”，但无法解释“知觉背后的客观实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将“存在”悬置，聚焦“意识的意向性结

构”，认为意识通过“指向对象”建构意义，但脱离了意识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存在；物理主义取消论将“存在”等同于“物理实体”，试图取消意识的独立地位，将其还原为物理过程，却忽视了意识的主观性与意义性。黑格尔则站在辩证唯心主义立场，将“存在”理解为“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认为意识是“绝对精神认识自身的过程”，虽把握了意识的辩证发展性，却陷入了唯心主义泥潭。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及其他哲学家的基础上，将“存在”定义为社会性的存在，本质是实践活动，认为意识是“对社会实践的反映与超越”——它既以社会实践为物质基础，又能通过抽象思维指导当下的实践活动。这种对意识观的理解，既克服了经验主义的片面性、现象学的唯心性、物理主义的机械性，也超越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将意识问题置于“唯物”与“辩证”的统一框架中，揭示了意识的“物质性”“社会性”“辩证性”三重特性，决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把握意识的哲学实质。

三、意识与人工智能

基于前文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观的辨析，可以明确人工智能本质上只是借助一定的算法和模型来模拟人脑构成与思维运作模式，它只能机械地执行命令，而绝对无法产生意识。当下，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ChatGPT、文心一言、讯飞星火等具有大规模参数和复杂计算结构的机器学习模型普及程度越来越高。但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快速发展，其运行的机制必须是“人工在前，智能在后”。这意味着，哪怕是计算能力最强大、最先进的智能机器，也不能产生意识，不能取代或超越人类。究其原因在于，意识是人独有的。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指出，“我究竟是什么呢？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9] 我们可以用“意识”来定义“自我”是因为意识有许多独到之处。比如说，随意。在吃饭这件事上“你”可以随意决定，思考时间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对于机器来说可不是，其处理办法是把它模型中所有涉及餐品的数据过一遍再选择一个出来。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模糊处理”的效率是比人低的，它也根本无法理解“随意”的思维特性。再比如，想象力。众所周知，人类思考的时候总是有着指向性的。思考的这种“关涉”被称为意向性。情感和其他心理状态总是关于或导向事物、人或事态。而人的心理状态最不寻常之处在于它们可以关涉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例如，我们可以思考美人鱼、独角兽和半人马，尽管这些事物都不存在。你可以想象一块不存在的石头，但对于机器来说这是不可能的。由此可知，人类意识是知、情、意的合一，人工智能只能模拟拓展人的智能，不具备情感、信念与意志等人类意识要素。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是“镶嵌”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历史产物。人类在劳动实践当中产生的意识不仅具有个体意义，它还是一种社会性关系。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社会关系，人在积极实现自己的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成人的社会关系、社会本质。”^[10] 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离开了社会属性人的本质将不复存在。当下，随着虚拟恋

人、性爱机器人等交往型人工智能产品的出现，颠覆了以往“人—人”的交往模式，人的主体性地位受到了强烈冲击。当人们不自觉把虚拟对象当作真实存在的人后，就会陷入到交往异化的漩涡之中。人工智能真的能够像人一样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吗？答案是否定的。人类的社会属性本质上是“在实践中相互建构的关系网络”，这种建构包含三个核心要素：一是“意图互认”——人类在交往中能理解对方的行为意图，并根据意图调整自身行为；二是“价值共享”——人类在社会关系中共享基本的价值规范，这些规范源于长期的社会实践，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三是“责任担当”——人类在社会关系中能意识到自身行为的后果，并主动承担相应义务。而 AI 的“社会交往模拟”仅停留在“行为模仿”层面，缺乏这三个核心要素：在“意图互认”上，AI 无法理解人类行为的深层意图，如虚拟恋人无法体会人类“倾诉烦恼”的情感需求，仅能根据预设话术回应；在“价值共享”上，AI 无自身的价值判断。为了证明这个观点，哲学家 Nick Bostrom 于 2003 年提出一个“曲别针制造机”的思想实验。假设你在办公的时候，手头没有整理文件的曲别针，这个时候你给人工智能索菲亚下定了一个指令：制造越多越好的曲别针。索菲亚在接收这个指令后，刚开始，它利用身边能够搜集到的材料来制造曲别针，在这之后，在效用函数的作用下它尝试研究股市赚取资金建立越来越多的曲别针厂。当人类试图阻止索菲亚疯狂制造曲别针的行为后，索菲亚把人类视为妨碍它完成任务的“Bug”，毁灭了全人类，一个只有曲别针的世界达成了。但凡索菲亚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这样荒谬的事件都不可能发生。由此可见，“曲别针制造机”无法理解“人类生存”的价值高于“制造曲别针”，仅能根据效用函数执行指令；在“责任担当”上，AI 无责任意识，如 AI 在社会管理中出现决策失误，其“责任”最终需由人类（开发者、使用者）承担，AI 自身无法承担任何责任。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AI 因无法参与真实的社会关系建构，缺乏“意图互认”“价值共享”“责任担当”等社会属性核心要素，因此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社会存在”，其模拟的社会交往也只是人类社会关系的“镜像”，而非真实的社会关系本身。毫无疑问，社会性是人类意识的本质属性，人工智能并不具备该特征。

近几年，如何“实现人和机器对话”成了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的焦点。而以现在的技术，自然语言处理（NLP）研究还受到环境、语义、标准口音和地方方言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究其原因在于，人工语言和自然语言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2]，人类语言的意义并非符号与对象的固定对应，而是源于“语言与思维、实践的辩证统一”——语言的意义生成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概念层面，语言符号对应思维中的概念，而概念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如“水”对应“无色无味、可饮用的液体”这一概念，人类通过“喝水”“用水灌溉”等实践形成“水”的概念。二是语境层面，语言的意义随语境变化，如“他真行”在“夸奖”语境中是肯定，改变语调或者在“讽刺”语境中则是否定；而语境本质上是社会实践场景的浓缩，同一句话

在家庭、职场、学校的环境中有着不同的暗示。三是“情感价值层面”，语言承载人类的情感与价值，这些情感价值源于长期的社会交往实践；提及祖国母亲，一个是联想着“母亲”所承载着宽厚、温暖的胸膛和宽容、慈爱的心；另一方面则是会联想到中国数千年的历程和孕育，托载着一代又一代人。AI 的自然语言处理仅能把握语言的符号属性，无法触及这三个意义生成层面：在概念层面，AI 通过数据学习掌握“水”的符号特征，但无法理解“水”的概念源于人类的实践体验，没有感受“渴”的体验；在语境层面，AI 通过算法分析语境中的关键词判断意义，但无法理解语境背后的社会实践场景，如讽刺语言背后牵扯到的人际关系；在情感价值层面，AI 通过大数据搜索将情感与特定词汇相联系，如“母亲”关联“慈爱”模拟情感表达，但无法理解“母亲”一词承载的真实情感价值。赛尔的“中文屋论证”正揭示了这一局限：AI 如同“中文屋里的外国人”，仅能通过符号匹配生成语言，却无法理解语言背后的思维、实践与情感，因此永远无法真正掌握自然语言的意义。无可置疑，自然语言是人类所独有的意识实现形式，人工智能无法真正理解自然语言的真实意义。

在哲学史上，莱布尼茨曾经想要建构出一种“理想语言”：这种语言由代表观念的符号组成，符号的所指必须清晰明了、理性可知，并且能够像数学一样计算并推理。莱布尼茨试图把语言数字符号化，那人的意识内容也能全部被约化吗？答案是否定的，人脑中有很多意识内容无法被约化的。比如潜意识，弗洛伊德在分析梦境的时候得出结论，梦的根源是我们的潜意识。潜意识是人类意识独有的结构，是无法觉察的心理活动；它持续发挥作用，却难以被人感知、难以用语言表达。其中，直觉思维的发生是一瞬间的事，比如“开窍”、“顿悟”和“灵感”等等。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一步成圣”能够通过数理逻辑来分析和表述吗？这是不可能的事，对于直觉思维人们只能描述其心理状态，而无法约化为数字符号。人类意识除了可通过语言符号表达的“显意识”，如理性思考、逻辑推理，还包含无法用符号化、数字化描述的“非符号化意识”，这是 AI 无法模拟的核心领域。首先是“潜意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揭示，潜意识包含人类被压抑的欲望、情感与记忆，这些内容虽未被清晰意识到，却深刻影响人类的行为与思维。如梦境中的象征、口误中的潜意识暴露。并且潜意识的非符号化特征体现在：它无法通过清晰的语言或数字表述，且其活动遵循“快乐原则”，即本能的一种最初的形式，为实现目的做出的最快反应，而非逻辑规则。AI 作为遵循逻辑规则的符号系统，无法模拟这种非逻辑、非符号的潜意识活动。其次是“直觉思维”，直觉思维是人类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非逻辑认知能力”，如科学家的“灵感”、艺术家的“创作火花”。直觉思维的非符号化源于其实践积淀性：它是人类将长期实践经验内化的结果，如老中医的“望闻问切”，这些经验无法通过符号化的算法传递给 AI。最后是价值意识，人类对真善美的价值判断，虽可通过语言表达，但其深层依据是无法符号化的价值体验，言语中描述帮助他人是正义善良远不如实际生活中去帮助他人的实践活动来的更真情实感。这种体验是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积累的，具有主观性与个体差异性，AI 作为无实践体验的机器，自然无法形成这种非符号化的价值意识，只能通过学习人

类的价值判断标签、模拟价值表达，但无法真正理解价值的内涵。因此，人类意识的非符号化维度，是 AI 无法突破的“意识壁垒”，也从根本上决定了 AI 无法真正具备人类意识。另外，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人工智能有没有进行自我反思的可能？它可不可以自我断电？它有没有欲望？它能否像人一样，按照自我颁布的法则去行动？这些问题也为思考人工智能中的“意识”问题提供了不同视角。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人类意识是人类所独有的，人工智能可以模拟人类意识活动原理，但不可能真正具备人类一样的思维意识。

四、结束语

近几年，随着 ChatGPT、Soar 和 Open AI 的快速普及，机器学习、神经网络和大数据模型走进人们的视野，人工智能的跨学科研究再次掀起一次浪潮。追溯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人工智能的每一步都深深烙印着哲学的印记。人工智能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中叶，那时的计算机科学家们受哲学思想的启发，开始探索如何让机器模拟人类的智能行为。哲学家们对于人类思维、意识、认知等问题的探讨，为人工智能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比如，在人工智能发展之初，符号主义把人工智能的理论建构在人工符号语言和相应的逻辑推演之上。但随着“人类的思维系统能否全部形式化”也就是传统的哲学命题“形式逻辑能否包含全部真理”这一问题的出现，纯逻辑主义的人工智能研究日渐式微；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异军突起的联结主义，其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建立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从结构和功能上模拟人脑神经网络的活动原理。而模仿人脑神经网络运行的 M-P 模型自身无法回应“机器真的能够完全模拟人脑对信息加工的模式吗”这一问题。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和哲学理论“互为靶向、双向奔赴”的特性。当下，英美的心灵哲学和人工智能研究呈高度融合的趋势，但他们对唯物史观视域下人工智能研究持主观的拒斥态度，他们完全忽视了这一派别所著的论述和提出的思想。这种从意识形态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简单说“不”的行为，也导致他们不可能客观评价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人工智能研究。因此，站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探讨人工智能的相关问题在当下格外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向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致贺信 [N]. 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xinwen/2019-05/16/content_5392134.htm
- [2] Thomas Nagel. 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LXXXIII, 4 (October 1974) : 435-50.
- [3] 安东尼奥·达马吉欧. 意识究竟从何而来? [M]. 台湾：商周出版社，2017:30.
- [4]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25、153.
- [5]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1、92.
- [6] 王南湜. 从“意识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看人工智能的意识问题 [J]. 河北学刊，2023（7）.
- [8]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12.
- [9] 笛卡尔. 第一哲学沉思集 [M]. 庞景仁，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9.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4.
- [12] 本书编写组.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6.